

第 七 篇

封建社会没落时期(清代) 的哲学思想

(公元 1646 年—公元 1840 年)

第一章

清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

第一节 明末及清代的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从明代中期到明末一百多年间，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封建统治集团已经极端腐败。皇室、贵族、宦官、官僚、大地主疯狂地进行搜括，土地高度集中，贵族、宦官占田有多达数百万亩的，把广大农民推进破产的深渊。统治者穷奢极欲，无休止地兴修土木，加上庞大的边防军费，沉重的赋税徭役，使得广大贫苦农民难以生活。当时水旱蝗灾连年不断，统治者的贪欲毫不收敛，结果造成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重局面。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颁布的檄文指出：“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袴，而特为腹心；宦官悉龀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明季北略》卷二十）这些话生动而深刻地说明皇室、贵族、宦官、豪绅凶恶残暴的本质。广大人民再难以忍受那种敲骨吸髓的剥削，“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的农民革命形势已经形成。公元 1627 年（天启七年）在陕北爆发的农民起义很快成为燎原烈火。1628 年（崇祯元年）高迎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

军在陕北起义，两年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在延安起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逐渐汇成不可抗拒的洪流。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 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横排本第588页）

农民革命军以“均田”“免粮”作号召，鼓舞起广大贫苦农民的斗志，坚决反抗封建统治，给了封建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汉族地主阶级与清朝贵族的勾结，农民起义最终遭到失败。1644年，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农民军作战失利，退出北京。清兵占据北京以后继续长驱南下，开始了汉族和各兄弟民族抵抗满洲贵族统治者的斗争。

清兵入关后，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发生变动，反明的农民起义军转到抗清的立场，有可能与地主阶级的抗清武装协同作战。但是南明政权仍然十分腐败，一些野心家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并且敌视农民革命军，加上满洲贵族收买奸细，分化离间，始终不能形成统一的抗清力量。虽然广大人民不甘忍受残酷的压迫，使抗清斗争得以坚持数十年，但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

毛泽东同志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这是对历史上一切民族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满族贵族为了维持其统治地

位，极力挑起民族之间的仇视，对汉族及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反抗进行残酷的镇压。象残酷的“嘉定屠城”、“扬州十日”以及对蒙古噶尔丹部、准噶尔部，对青海回族、新疆维吾尔族和对西藏的镇压，都十分残酷。民族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更为复杂。但是满族贵族和汉族及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的矛盾，说到底，还是阶级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满族贵族为了实现其掠夺、剥削的野心，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采取收买拉拢的政策，而汉族大官僚地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革命，也需要依靠满族贵族的武装力量，满汉大贵族地主阶级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共同充当镇压各民族人民反抗的刽子手。因此，明末清初的广大人民的反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表现。

明中叶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已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末嘉靖之后，商品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由于中央政府财政枯竭，迫切要求增加税源，对工商业的控制放松了。象崇祯年间“命采平阳、凤翔诸矿以储国用”（《明季北略》卷十二）即其一例。大批破产农民流入城镇，投入手工业作坊或矿井作工，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多，消费品的需求量也加大，扩大了商品流通的市场；这许多条件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生。当时手工业作坊日益发展，分工更为细致，如纺织业有丝织、棉织、麻织；由于纺织业的发达，染料业也发展起来；瓷器、漆器都成为手工业最大行业，而且制艺精美；随着印刷业的发展，造纸业也大大发展，嘉靖时已有铅字印刷；矿业已有颇具规模的小煤矿、小铁矿等；冶炼、铸造业发达，除制造各种工具，还精制各种兵器，有了铁铤、火炮，还有仿制的西洋武器等；此外，铜器（景泰蓝）、玻璃、造船业都很著名。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苏州那样的纺织工业集中的城市，出现了景德镇那样的瓷都。沿海各地商品生产最为活跃，国际贸易也有很大发展。

商品生产的发展，自由商人增多，在局部地区，如江浙太湖流域、湖广江汉等局部地区，出现新的市民阶层。为了反对封建控制，这一阶层产生了初步的民主要求。当时广大的手工业工人和矿工为要解除封建的枷锁也积极参加反封建压迫的斗争。这样的记载甚多，较为著名的有公元 1599 年和 1600 年（万历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发生的荆州市民和武昌市民反陈奉的斗争，公元 1601 年（万历二十九年）发生的苏州织工反孙隆的斗争等。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根本政策仍是“崇本抑末”，对工商业实行种种限制，因此，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很微弱的。而且因为地区的差别，工商业的发展也是极端不平衡的。在沿江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因素较为显著，而在交通不便的内地，不具备资本主义因素发生的条件。

清贵族入关，明末某些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破坏。到了康熙后期和乾隆、嘉庆年间，由于国内的反抗基本上镇压下去，出现暂时稳定局面，社会经济又有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亦有所活跃，特别是东南沿海手工业已有些基础的地区，如苏、杭一带商品生产又发展起来。手工业如丝织、棉织、造纸、制茶、瓷器、矿业、冶炼等，有超过明末的趋势。尤其是丝织、瓷器、雕漆等曾畅销国际市场。

清代封建社会到乾隆、嘉庆时是它的全盛时期，也是社会隐伏着严重危机的时期，阶级的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土地和财富为贵族官僚所垄断。《红楼梦》通过艺术形象揭露了这一时代的

社会矛盾。“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遮不住从里面开始溃烂的脓疮。透过一个家族的衰败、没落，可以看出所谓乾隆盛世的封建社会已经千孔百疮、危机四伏。乾隆时被抄家的大官僚和珅，占有土地八千多顷，有当铺、银号、商店百余座，抄出金银珍宝绸缎皮货等无算，也说明当时的统治集团已是极端的豪华和腐朽。由于阶级压迫的惨重，不断激起农民的反抗，秘密会党如白莲教、天理教、哥老会活跃起来。公元1812年（嘉庆十七年）天理会起义战士曾攻入北京紫禁城。

清朝统治者害怕社会的进步动摇其封建统治，采取保守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微弱的资本主义因素在种种限制和打击之下，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清朝统治更加腐败不堪，不可救药，社会愈益转向没落。乾、嘉以后，便急转直下，社会的严重危机充分暴露出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面前，腐朽的清王朝采取卖国投降的政策，使中国很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明末以来的自然科学亦有显著发展，随着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从冶炼器械到饮食和生活用品都有科学的总结。随着农田水利耕作经验的丰富，出现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不仅总结了古代农田耕作经验而且根据当时实践提出独到的见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为我国古代本草的集大成作品，是世界科学史上重要的药物、植物和动物学巨著。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对明末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也作了一般性的介绍。清代学者梅文鼎、焦循等对数学的研究也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焦循的《里堂算记》在我国古代数学史上具有较高水平。

明清之际自然科学的特点是吸取了西方自然科学的一些成

果。当时来华的传教士翻译了不少欧洲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曾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汤若望（日耳曼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传教士），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士，翻译了许多物理、数学、天文、地理、地质等方面的科学著作。西方传教士负有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使命，他们的自然科学理论也夹杂不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如象天文学上的地球中心说等等。但他们介绍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客观上还是有助于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当时西方的一些实证科学被称为“质测之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许多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自然科学家。

第二节 明末及清代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清贵族入关后，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反映到思想战线上亦甚错综复杂。由于民族矛盾一时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斗争进到一个新的形势，以满族贵族与汉族大官僚地主为一方，以广大汉族及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族地主阶级分化为投降派和抵抗派，广大的农民革命军也转变到抗清的立场，并且成为抗清斗争的主力。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推动了地主阶级抵抗派当中一些人产生要求改革腐败政治和批判腐朽理学的进步倾向。在哲学战线上，反对程朱陆王的理学和心学，成为这一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内容。

明末清初进步的思想家，在政治上，许多人有猛烈抨击君主制度的言论，象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激烈地指责君主

制度说“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王夫之也提出“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一》）。稍后的唐甄则攻击“凡为帝王皆贼也”（《潜书·室语》）。思想家们从其根本立场来说仍然属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竟对封建纲常的核心“君为臣纲”提出非议，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思想上这一显著特点，有它的极为深刻的时代的社会根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的思想的产生和新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有密切联系的。首先，由于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曾经十分强大的封建王朝，武器的批判戳穿了君主专制的腐朽性，皇权的威风扫地，封建的纲常被打乱了，这就为进步的思想家攻击君权提供了条件，使他们有可能对“君为臣纲”进行激烈的抨击。第二，封建王朝的大权完全集中在皇帝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社会危机空前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统治集团上下离心争权夺利，使得皇帝更加依赖宦官，而宦官则是社会上极为腐朽反动的势力。皇室、贵族、宦官和官僚之间的矛盾也对封建统治起着削弱的作用。这也激起下级官僚和中小地主阶层的不满，他们要求对皇室贵族的权力加以适当限制，这也是进步思想家非难君权的一个原因。当时地主阶级抵抗派大多受到过皇室、宦官和大官僚的排斥、迫害。第三，对君权的怀疑和动摇与当时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即资本主义萌芽也有密切关系。进步的思想家反对君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明夷待访录》）。筹政治理想，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初步的民主要求。在经济上，进步的思想家反对封建的崇本抑末的政策，反对压迫工商贸易，提出“工商皆本”，也反映了市民阶层某些利益要求。

由于阶级斗争的这种新的形势，反映在思想战线上就具有

和已往不同的新的特色。进步的思想家反对民族压迫，已不只是为了恢复汉族地主阶级的王朝，而是具有对未来新的社会政治的憧憬，因而他们敢于向封建的纲常作某种挑战，对维护腐朽封建统治的程朱理学展开比较激烈的批判。

在哲学思想上，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度，出现了王夫之那样的唯物主义体系。唯物主义者对宋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明、清的统治者都把程、朱的唯心主义理学奉为正统思想，用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禁锢人民的思想意志。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要鼓舞起人民的反抗斗志，不从思想上打破腐朽的唯心主义理学的控制是不成的。同时，作为程、朱一派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补充，陆、王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在明末以来流毒亦广，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也成为当时哲学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由王夫之开始 经过颜元到戴震 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 从根本上动摇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权威”。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双方的斗争是围绕理、气，知、行，心性等方面全面展开的。

在理、气问题上，唯物主义者以元气本体论反对唯心主义超越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性的“天理”本体。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元气，物质元气构成宇宙的实体，理只是元气运动的秩序条理。元气的运动变化：“絪縕相荡”、“气化流行”成为物质世界发生发展的根源，根本否定有一个超越物质世界之上的“虚托孤立之理”。这样从物质世界的本源上说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便在根本上驳倒了理学唯心主义。

在知、行问题上，唯物主义强调行先知后，重视实际行动在认识上的作用 反对程、朱“知先行后”和陆、王“知行合一”等排

斥客观实践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王夫之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唯物主义命题，在认识论的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具有辩证因素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先知以废行”和“销行以归知”等客观的及主观的唯心主义。颜元在和主、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作坚决斗争中，十分强调“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把重视实际行动和经验摆在极高地位，提出了他的重视实际经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戴震在认识论上提出“血气心知”的观点，论证感觉和认识的源泉在客观世界，感觉和认识是人的天然的生理需求和本能，用以反对理学先验论。

在心、性的问题上，唯物主义的进步的思想家都反对用先验的道德律去戕害人性。他们都强调后天的环境对于形成人性的重要，否认有天生的一成不变的人性。他们认为心、性都不能脱离物质的形体单独存在，反对把所谓“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对立起来，从而坚决反对“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王夫之明确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中”，“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颜元提出“生之谓性”，“形性不二”，他所谓“生”即指人的生活，人性的形成离不开人的生活和形体的要求，用先验的道德律去遏制人的正当的物质需求是不成的。戴震也强调“理存乎欲中”，“欲其物，理其则”，欲望是生而具有的，如果人没有欲望，也就没有形体生命了，他揭露唯心主义理学家所说的“天理”的虚伪性残酷性，指出他们“以理杀人”，深刻地揭露了理学的反动本质。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则是以艺术的形象对吃人的礼教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将那“以理杀人”攻击得体无完肤，它已经具有以新兴市民的人性反对封建腐朽的人性的意义，因而带有更多的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了。

这一时期朴素唯物主义的体系往往与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紧

密结合着。这一总的趋势自张载、王安石已开始，到王夫之发展得更加充分。他们强调“一物两体”、“有一则有两”强调对立统一，正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反映。特别是在明末，正如黄宗羲所说的“明朝灭亡，使一部分地主阶级感到‘天崩地解’”，农民大起义埋葬了封建的明王朝，社会分化为两个极端，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而推动进步思想家产生明确的“一物两体”、“有一则有两”（矛盾）的概念。王夫之的思想体系中，对于对立与统一、物质与运动、本质和现象、主观和客观，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克服了以往朴素唯物论所具有的机械论、命定论的缺点。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们还有不少缺点。由于他们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的社会改革的要求是有限度的。他们虽具有某些民主性的要求，但是并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而且是以托古改制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理想，因而他们所提倡的变革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是行不通的。他们批判宋明以来腐朽的唯心主义，本质上是反对儒家的正统思想，但是又借助于古代的亡灵，抬出孔、孟与程、朱、陆、王相对立，因而他们不可能将批判理学的斗争进行到十分彻底，不可能和传统的儒家思想决裂，他们的思想当中保留着不少封建的糟粕。

在哲学世界观方面，他们的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朴素唯物主义的范围。用“元气”说明宇宙的构成，不可避免地带有臆测的局限性，只有列宁的物质定义才是对世界唯一的科学的解释。旧唯物主义用某种设想的细微的物质即元气来解释世界，还不是科学的。在认识论的方面，他们还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不能正确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因而他们不

是具有唯理论的偏向，便是具有经验论的偏向，使他们的思想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唯心主义杂质。在心、性问题上，他们反对先验的人性论和先验的道德观，但地主阶级的立场，又使他们冲不破封建伦理规范的网罗，他们仍然是以封建的道德作为判别人性的标准。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仍然还是极有限度地说明世界，并没有能够成为改造世界的武器。

到了近代，我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同时，也积极吸取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于是被压制了一百多年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某些具有民主要求的思想，又得以重放光彩。

第二章

黄宗羲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民主性的政治思想

黄宗羲生于 1610 年(明万历三十八年)死于 1695 年(清康熙三十四年)^①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末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史家。明朝后期宦官掌握国家大权,形成“阉党”,黄宗羲的父亲就因揭发宦官魏忠贤的罪恶而被害。宗羲父子都是同明朝封建统治阶级里最腐朽、黑暗的“阉党”作斗争的。他的阶级立场代表了下级官吏和中小地主阶层。明亡以后,他曾几次参加抗清斗争都遭到失败,转而从事于学术研究。

黄宗羲不仅通经、史,对于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各方面都有广博的知识。他批评明朝空洞虚浮的坏学风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他批评那种脱离政治的状况,“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黄梨洲文集·留别海昌同学序》),他主张学术要经世致用。他是刘宗周的学生,在哲学思想上受刘宗周的影响较深,刘宗周批评朱熹之学“半杂禅门”(《明儒学案》^②卷六十二《蕺山学案》)。黄宗羲的哲学在自然观方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在认识论方面则属于唯心论的先验论。黄宗羲大力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明儒学案》共六十二卷,以下引用只注明卷数。

抨击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 批判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思想 这是他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的著作很多，编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两部断代哲学史，还有《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破邪论》《黄梨洲文集》等都是关于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的重要著作。

第一节 “君为天下之大害”的 民主性的政治思想

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狠狠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罪恶本质。明朝后期，在江南一带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手工工场，大批雇佣劳动出现。加以明末长期的农民革命战争，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这些社会条件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使明清之际进步的思想家能进一步地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因之，他们往往对于明末腐败的政治表现出不满，对于封建君主专制独裁能更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并且具有某些民主性的思想。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写成于 1663 年(康熙二年)这本书集中表现了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书中明确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原君》)又说“天下之治乱 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君的责任就在“以天下万民为事”。臣也是“以天下为事”并不是为君而设的。君如果“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同上)，臣也没有无条件效忠于君的道理。君和臣共同的职责就是为“天下万民”。这些具有民主性的思想封建统治者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所以乾隆时《明夷待访录》被

列为禁书。顾炎武曾经读到这部书，非常推崇，说是“百王之敝可以复起”（《与黄梨洲书》）。《明夷待访录》里突出地批判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具有民主思想的色彩。黄宗羲说：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

他揭露封建的专制皇帝以天下为自己的家产，把自己的“大私”说成是天下的“大公”，为了自己取得天下，使人民妻离子散，肝脑涂地。他们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又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用来满足他们荒淫腐朽的生活，使老百姓家破人亡，天下之大，没有一个地方能得安宁，就是由于封建皇帝专制独裁，“压迫剥削的结果。但是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我产业的利息。“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把天下之利尽归于自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民，所以“君”成了天下的大害。因此人民把君主视为“寇仇”，称为“独夫”。君主成了广大人民的敌人。而宋朝的程朱等人却认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甚至象桀纣这样的暴君，也认为不当诛。黄宗羲直斥他们是“小儒”，他们效忠于一人一姓，却把千百万人民的性命看得一钱不值。他说：“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这是说，共同以天下为事，君臣之间就是“师友”的关系，不以天下为事，只向一人一姓效忠，就是“君”的奴婢。这些“小儒”正是“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奄

官上》)。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封建帝王的奴才。

黄宗羲批判了历代皇帝把天下人民看成“橐中之私物”的封建观点 提出“君臣共治”的思想。他说：

“缘夫天下之大 非一人之所能治 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原臣》）

他认为天下之大，不可能一人独治，必须君臣联合起来，各自分管一部分才行。做官的是为天下，为万民，并不是为国君一人一姓办事。为天下万民 这是合于“道”的 为一人一姓 就是“非其道”。他把天下比成象一个大木材，君和臣都是拉这个大木材的人，前后必须配合好才能顺利前进，一方面不合作就会影响运送，这就是失职。他说：

“盖自外而言之 天子之去公 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 自内而言之 君之去卿 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 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置相》）

天子不过是比公、卿高一级的官 就好象公比侯高一级 卿比大夫高一级，这说明天子并不是至高无上的。黄宗羲在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罪恶之后，进一步批判封建的法制。他说：

“后之人主 既得天下 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 子孙之不能保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 汉建庶孽 以其可以藩属于我也 宋解方镇之权 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他认为秦汉以后的封建法制都是历代皇帝一家一姓出于自己的“利欲之私”炮制出来的，因此创立这种法和破坏这种法的